

格 萨 尔 研 究 丛 书

《格萨尔》论文选

齐木道吉

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序

王雨顺

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其篇幅浩繁、场景壮阔、结构宏伟、诗文绚丽而著称于世。它那包罗万象的内涵，是我国藏族历史、社会、思想、生活的总汇。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难怪中外学者把《格萨尔》史诗，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

—

对《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它的抢救工作。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翻译。当时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格萨尔》史诗调查团”，深入到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开展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61年初统计，从民间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

本达150余部，除去内容大体相同的异文本外，实际搜集到34部。同时，还组织人力将其中的74部翻译成汉文，计1000余万字，为以后进一步开展《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整理、翻译工作，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正当抢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伟大的藏族史诗，也在劫难逃。数年搜集和翻译的资料，几乎被全部付之一炬。曾经参加过抢救工作的同志，也各受摧残，甚至因之而献身*。《格萨尔》史诗被打成“毒草”，抢救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遭到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西藏、四川、青海、内蒙、甘肃等有关部门，即为被打成“毒草”的《格萨尔》史诗，恢复了名誉。并先后将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七省区的《格萨尔》抢救工作。西藏、四川等七省区也相应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由省自治区领导直接抓这项工作。从此，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 <贵德分章本>的搜集者、汉译者华甲，即于1966年因<格萨尔>史诗是“大毒草”，而被迫害致死。

十余年来，由于得到各级党政的支持，得到广大蒙、藏、汉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到1991年底北京举办“《格萨尔》成果展”时，搜集到的分部本已达141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4倍多。原保存于青海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失的翻译资料，又基本搜集齐全了。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牧区，进行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的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西藏的扎巴、玉梅，四川的仁孜多吉、青海的仓央嘉措，即是这次普查的收获。他们都是能说唱数十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其中扎巴等10人，在1991年还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的称号。并将其中12人的说唱记录本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在搜集各种版本和对艺人说唱录音记录的基础上，也同时开始整理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七省区及北京已出版藏文本62部、蒙文本9部，汉译本30余部。仅四川省就整理出版了13部藏文本，有的还进行了第三次印刷，累计数达50余万册。全省百万藏胞，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册。这正说明广大读者，对《格萨尔》工作的肯定。

*扎巴自报43部；玉梅自报60部；仁孜多杰自报29部。

二

十年来，虽然《格萨尔》工作的重点是抢救，也就是搜集、整理和适当地进行一部分汉译。同时，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十分活跃。

1983年和1985年就先后在西宁和赤峰两地，召开过“《格萨尔》史诗学术讨论会”，由于当时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因而提交会议的论文，对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还有局限性，文章无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直到1989年底，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大规模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才算正式拉开。

到现在第二届、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已先后召开，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决定1996年在兰州举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性研究《格萨尔》史诗的热潮，已经来到。《格萨尔》史诗，将与《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同登世界艺术殿堂。那种“中国没有史诗”*的论调，从此

*黑格尔在其所著《美学》一书第三卷中说：“中国人没有史诗，（因为）他们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位改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哲学家，以权威的口吻，做了这个断言，其影响是相当大和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没有史诗”，即几乎成了定论。

休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到1993年底止，在国内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达176篇。如果加上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二者加在一起，当在400篇左右（土登尼玛的《格萨尔词典》及王兴先、降边嘉措、吴伟等的专著尚未计算在内），仅在短短的4年中，即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即如早已誉满世界的《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等史诗，在它们成为研究热点时，也从未达到每年平均研究文章百篇以上的盛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格萨尔》史诗如此重视，相信《格萨尔》工作者们所向往的出现一个《格萨尔》研究体系的局面，已为期不会太远了。

三

为了更好的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辑了这套丛书，目的主要有二：

其一，丛书的编辑，实际是对我国60年来《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虽然今天《格萨尔》史诗，已饮誉世界，可过去几百年来，它除了藏区流传外，就连我们这个被称为

格萨尔故乡的四川省，也还鲜为人知。要不是在50多年前任乃强、韩儒林、彭公侯诸先生的大声疾呼，建国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许今天它们仍未走出藏区，更不说饮誉世界了。在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一分册即系任乃强先生的传世之作《藏三国》，文章虽不长，仅有400余字，它刊登于1930年的《四川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搜集到介绍《格萨尔》史诗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有64年。文集中任老撰写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这篇论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继任老之后，对《格萨尔》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层出不穷，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丛书将收录30名学者的文章陆续集辑成册，既有老一辈的，又有中青年后起之秀。虽工程浩大，仍将挂一漏万。

当今《格萨尔》史诗，不但走出藏区，而且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这与60年来无数《格萨尔》史诗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研究分不开。所以我说这是一次《格萨尔》工作成果的展示。

第二，60余年来，虽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爱好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散见于国内大小报刊，它们对《格萨尔》史诗得以走出藏区，饮誉世界功不可灭。可直到今天，这些文章极少结集成册，其中不少仅在

“索引”中出现，很难窥其庐山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散失，而失掉其借鉴价值，这将是一个无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个丛书的编辑，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

目 录

- 蒙文《格斯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作品……………（ 1 ）
- 关于蒙文《格斯尔》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26 ）
- 蒙古《格斯尔可汗传》的艺术成就……………（ 46 ）
- 蒙古《格斯尔可汗传》的思想内容……………（ 63 ）
- 布里亚特《格萨尔》与蒙古神话……………（ 75 ）
- 蒙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
 辨析……………（ 84 ）
- 关于蒙文《格斯尔》的几个问题 ……（ 109 ）
- 齐木道吉小传 ……钱惠君（ 139 ）
- 齐木道吉先生主要著译 ……（ 144 ）

蒙文《格斯尔》是蒙古族 英雄史诗发展到一定阶段上 出现的作品

蒙古族是保藏着极为丰富的英雄史诗遗产的民族。既有很多数百诗行的短篇史诗和数千诗行，甚至上万诗行的中篇史诗，又有象《江格尔》、《格斯尔》那样数万诗行数十万字的，以人物为中心，并且各部分在情节上又能独立的长篇史诗。从而在世界蒙古学研究者，特别是在史诗学研究者中早已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现在很多中外学者在深入研究和探讨，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世界史诗学科学研究的对象。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史诗学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探讨蒙古族史诗遗产，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通过对史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民族文学发展的道路，从中吸取养料，促进社会主义民族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因为史诗遗产仍是当今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蒙古族的史诗遗产是蒙古人民审美理想和艺术才华的表现，是人民

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蒙古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形象化的历史。它不但给予过去的人民群众以教益和艺术享受，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因此，蒙古史诗研究，现已成为世界性学科和学术活动的今天，很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和我区史诗研究的水平，从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加强我国和我区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研究科学体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蒙古族英雄史诗有它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的全部过程。关于英雄史诗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里已有精辟的论述。他们用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来说明艺术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时指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①关于这方面，别林斯基也曾指出：“史诗是在民族意识刚刚觉醒时，诗领域中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史诗只能在一个民族的幼年期出现”。^②关于史诗产生的历史原因。高尔基指出：“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

唤起了他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③上面所说的所谓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应该包括从原始艺术的产生到文明社会的真正的艺术产生的整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史诗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般来讲，它的产生却只能在人类的早期阶段。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史诗这个艺术形式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时期到高级阶段，进入文明时代时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文学体裁。但是，利用这种体裁创作的某一具体作品，可以有早期（前期）的也有晚期（后期）的。因此，在一些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民族中仍然继续产生着，如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史诗都是在中世纪中期（11—12世纪期间）的作品。蒙古族英雄史诗在蒙古族历史上的哪一个阶段里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蒙古族的原始社会已经解体，母权制被父权制所代替，氏族部落间的战争开始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叫做“英雄时代”，而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是属于早期的英雄史诗，是民族崛起时代的产物，即蒙古社会的英雄时代——蒙古民族形成时期产生的最先成熟的艺术形式。蒙古族人民中长期以来口头流传下来的许多短

篇史诗和部分的中篇史诗所反映的生活方式、战争性质、民族风习等，就可以证实这个问题。在那些短、中篇史诗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氏族部落时期的特点——以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的英雄业绩为内容，以神异传奇手法，反映娶亲、抢婚、掠夺牲畜财物、奴仆和人众等氏族部落间的战争。婚姻关系上反映的是氏族部落社会的族外婚姻制。史诗的主人公总是为了找寻或去娶其父母早先缔结的配偶而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用武力抢劫他人妻女而发生战争的事情，在蒙古族早期英雄史诗里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在史诗里代表丑恶势力的幻化物（形象）——蟒古思，总是乘勇士出猎之机，掠走他美丽的妻子，勇士返回后立即追赶到魔窟，经过一场激战，终于夺回被抢走的结发之妻。这一方面反映了氏族部落社会解体时的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和母权制已被父权制所代替。另一方面反映了抢婚制在其后期阶段，抢劫妇女现象虽然还未绝迹，但是，已经成为邪恶落后的现象。在后来的很多英雄史诗里，把抢劫他人的妻子或抢婚现象当作社会恶势力的反动、落后行为，来加以谴责的。史诗里所反映的这种情节，同当时的蒙古社会现实是完全一致的。如在《蒙古秘史》里记载的由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巴阿秃儿，从篾儿乞惕部落抢来河额仑兀真，而两个部落

之间结下仇恨，发生战争的事实。

从战争性质的发展变化看，只有一个故事情节的一篇史诗里反映的几乎都是抢劫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中篇或有两层以上故事情节的史诗里反映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抢劫妇女，还为了抢夺奴仆、牧人、牲畜财物。前一种英雄史诗产生在氏族部落社会的前期，后一种则是蒙古族社会里出现阶级分化时的产物。在英雄史诗里，把这种掠夺牲畜财物和抢劫奴仆、人众的人，当作社会丑恶势力的代表，来加以丑化成为某某蟒古思汗的。我们从这种蒙古族短、中篇英雄史诗所反映的战争，只能看出抢掠美人、仆从、居民和牲畜财物的性质，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复仇或掠夺抢劫，以及反击来犯者。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则都是部落首领，而在氏族社会里最有力气和最勇敢的人，才能被推选为首领。对这种首领虽然称呼为“汗”、“巴阿秃儿”（勇士）、“薛禅”（智者）、“篋儿干”（善射者）、“博克”（力士）等，但这些特殊称号只表明这些人的能力、智慧、体力、富贵等个人特长和财产的多少。因此，在蒙古族短篇史诗（和部分的中篇史诗）里所反映的特点，只是氏族部落时代的社会现象。因为，在当时还处在氏族部落时期的蒙古人中尚未产生国家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汗国、可汗，以及政权等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是成

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并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的事情。

以上是蒙古氏族社会解体时期产生的早期的蒙古族短、中篇英雄史诗的概貌。蒙古族英雄史诗到了蒙古民族形成，以及蒙古人以统一的文明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或建立了封建社会之后，作为晚期的英雄史诗，仍然在其早期的短、中篇史诗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成为发展阶段的英雄史诗，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著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在这里笔者只谈谈《格斯尔》（以下均只对以书面流传下来的蒙文《格斯尔》书写卷本，不涉及民间传唱的口头演唱本）的情况。

蒙古地区流传的《格斯尔可汗传》与藏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一作“格斯尔”，一作“格萨尔”，同是藏语Ge Saz一词的的汉文音译。藏文《格萨尔》是在藏族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富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很快得到广泛流传，并同蒙古族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合，经过蒙古族人民的再创造，终于发展成为一部蒙古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别具异彩的民族史诗。因此，在世上就分别称呼为藏《格萨尔》和蒙古《格斯尔》，并且认定它们是藏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所共同创造的，同时也是中华民

族共同的宝贵财富。由此，对藏蒙《格斯尔》的关系问题，笔者仍然同意并主张藏蒙《格斯尔》之间有内在的渊源关系，是“同源异（或分）流”的关系，即是说蒙文《格斯尔》是渊源于藏文《格萨尔》，是以藏文《格萨尔》为蓝本，或运用它的资料，或依据它的某部分情节，乃至结构顺序，而进行再创作的。同时也认为蒙文《格斯尔》既是蒙藏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又是蒙古族固有的英雄史诗在晚期（后期）发展（阶段）的产物。下面着重阐述蒙文《格斯尔》如何同蒙古族悠久文化传统，特别是同古老的英雄史诗相结合，发展成为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史诗的问题。

如上所述，蒙文《格斯尔》是按照自己民族独特的方式，吸收外来的文化，来发展与提高自身的同时，又是同自己固有的史诗创作传统相结合发展起来的，别具异彩的民族史诗。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主要表现浅析如下：

蒙古族英雄史诗最古老的题材之一，是以浪漫主义的幻想，描写传奇式的勇士，同人格化的自然力或丑恶的社会恶势力的代表——蟒古思的斗争。所谓“蟒古思”是一种幻化形象，半人半畜，有众多头颅的丑恶怪物，是一切妖魔鬼怪的总称。它起初是在蒙古族古老的神话故事里，人们以艺术想象力塑造出来的怪物（祸害物）——自然力的代表。后来转移到